

ННЕ

活

世界爱情经典名著

花城出版社

ОСКРЕСЕНИЕ



世界爱情经典名著

花城出版社

〔俄〕列·托尔斯泰著 文秉勋 曹世文译

复 活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文秉勋 曹世文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75 印张 1 插页 481000 字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360-2118-6
I·1822 定价: 27.00 元

道德真理的精神之光

——《复活》译序

孙正荃

俄罗斯一个“最后的贵族”，随着长长的囚徒队伍，踏上了漫漫征程，朝风雪弥漫的西伯利亚走去……那里既没有财富，也没有爱情，只有饥饿和寒冷。然而，他执拗地要朝那里去，对于他，那里似乎是天国，他的罪孽的灵魂可以安静地在那冰冷的土地上栖息，寻找回来原本属于作为一个道德主体的人自身应该拥有的那份精神。

突然，我脑海里凸现出了另一幕：寒冷的冬夜，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在风雪中逃离了他眷恋一生的波良纳，那温暖的故居，那安详的土地，那让他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三部煌煌巨著的地方。或许，他迈出第一步时心里便充满了赎罪的凛然，也充满了夕阳西坠般的美丽和宁静；或许，这位八十二岁的老人还沉浸在他追慕了一生的渴望之中，他曾在这里起草了解放农奴的方案，为农民举办过二十多所学校，他甚至因为厌恶农奴制、厌恶自己的贵族出身而持斋吃素，草履布衣，真诚而自然地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像样的农民，缝靴子，做农活……然而，他还是出走了。我想，他是最终地完成了一个人的螺旋，走向了永恒。

老托尔斯泰在波良纳的日月星辰中复活了！他生前没有留

下遗嘱，他的《复活》正是留给后世的一部辉煌的遗嘱；他墓地上没有碑石，他的《复活》正是他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尘世间树起的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1899年，《复活》这部他艺术上巍峨壮观最高峰的巨著发表了。创作这部作品，用了整整十年时间。七旬老翁，凝视着这部“新的、不寻常的”^①作品，凝视着自身，凝视着逝去岁月的风雨，凝视着自己忠贞的信仰和永远的期盼，一个巨大民族的道德灵魂在发出呼唤，在闪着火光。这部既成为生存意识、生命意识的表现，又成为作家自身生命力的返照的巨著，无疑，是对恶行的宣战，对善举的褒扬。然而，艺术家的托尔斯泰不是在对道德的永恒内容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宣扬和传播，他全力关注的是人和人的前途与命运，人怎么办？我怎么办？这是一种文化底蕴，文化精神。现在，我们看到，托尔斯泰穷毕生之精力构筑的精神道德学说，已被全世界所知晓，它的内在灵魂深深地扎根在亿万普通而善良的人心田里。

是的，《复活》用了大量篇幅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沙皇专制统治下的种种恶行，法庭、监狱、教会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一片漆黑。甚至在农村生活的描写中，《复活》也与《安娜·卡列尼娜》迥然不同，它着力展示的不再是自然性的农民生活，而是苦难深重的农村场景。在俄国文学史上，可以说还没有一个作家如托尔斯泰这样对社会生活的腐败、残酷、不合理作出过如此尖锐的批判。然而，《复活》的真义并不在此，作家的真义

^① 《托尔斯泰全集》俄文纪念版，第64卷，第235页。

也并不在此。复活——人的复活的主题同社会复活的主题始终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改革平民百姓的生活并使他们复活的思想始终同摧毁私有制及其危害的思想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即不仅需要否定恶的现象，而且要否定恶的根源，并在否定的同时，建立起对全人类普遍的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才是托尔斯泰学说的内在灵魂，也是《复活》这部不朽的艺术作品的主题。

想一想吧，《复活》开首那段对生活充满了赞美之情的话：

● 尽管好几十万人挤在不大的一片土地上，使劲儿地糟踏他们居住的这片土地，尽管他们用石头铺地，不让任何东西生长，尽管他们清除每一棵冒出土来的青草，尽管他们使用煤炭和石油而搞得乌烟瘴气，尽管他们砍伐树木，赶尽所有的鸟兽，——但就是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也终究是春天：阳光和煦，一丛丛的青草，只要人铲不尽它们，便生机勃勃地到处生长，到处泛绿，不仅在街心花园的草坪上，连一块块石板之间的缝隙里都是；而桦树、杨树、李树则舒展开自己充满汁液、散发芳香的枝叶，椴树芽苞胀饱欲裂，乌鸦、麻雀和鸽子已经兴高采烈地在逢春筑巢，连在阳光下暖和过来的苍蝇，也在墙边嗡嗡作响了。草木，鸟儿，昆虫，孩子们，都是满心喜悦的。

这是作者对人性的爱，对生活的爱，对未来的爱。罗曼·罗兰说得对：“托尔斯泰的批判始终具有建设的价值。他渴望重新建设；为毁灭而毁灭对托尔斯泰的精神来说是格格不入的。”^①

当然，《复活》的读者看到了小说中对恶的愤怒批判，铁石心肠的副省长马斯连尼可夫，以微末善举掩盖巨大丑行的枢密官沃尔夫，完全丧失人性的残忍至极的彼得保罗要塞司令克里斯木特将军，与人的感情最为“绝缘”的高级官僚托波洛夫，还有那些草菅人命的法官、从精神上奴役百姓的伪善透顶的神甫，等等等等。作品对这些从民事法官到各部大臣的“主宰者”们

^① 《罗曼·罗兰文集》第2卷第296页。

的揭露和鞭笞是何等辛辣、何等无情！然而，某些论者却认为，托尔斯泰在进行淋漓尽致的对“恶”的批判之后，主张的只是“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勿以暴力抗恶”，于是，托尔斯泰的这种批判似乎便显得苍白甚至虚伪了。

这是大谬不然的。

确实，托尔斯泰有他自己的伦理原则，这就是作为他学说核心的“全人类普遍的爱”，这个核心的两翼便是：“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勿以暴力抗恶”。为了正确地读懂《复活》，准确地理解托尔斯泰学说，有必要先就此作一些理论上的阐释。

（所谓“道德的自我完善”，乃是植根于托尔斯泰思想中对人的道义和良知的一种坚定信念），所以，他每每发出这样的呼吁：

人类弟兄们，醒悟吧，反省吧，要明白你们在干什么，回想回想你们是谁？要知道，你们在成为刽子手、将军、法官、总理、沙皇之前，你们首先是人……停止吧——这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个人，不是为了人们不再责备你们，而是为自己的灵魂，为不管你们怎样摧残都活在你们心中的上帝。^①

这段话的要义就是天国就在你心中。托尔斯泰就此写过一本书。这近乎性善论的教化，反映了他的教育观和道德观，其中无疑充满了人性的内涵。所谓“勿以暴力抗恶”，其宗旨并非“不抗恶”（托尔斯泰一生曾同“恶”作过何等坚韧的抗争，他的《哈吉·穆拉特》中的抗恶精神，又是何等旗帜鲜明！），而是如何抗恶。他主张的是“勿以暴力”这种方式抗恶。道理十分简单：在托尔斯泰看来，暴力本身也是一种“恶”，是一种不道德。以暴力这种恶去抗恶，便是以大鬼反对小鬼，因此，他认为抗恶最有力的方法并不是使用暴力。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是

^① 《我不能沉默》（1908年）。

他1884年3月的一则日记：“应该像老子说的——像水一样。它不可阻挡地流动，遇到堤坝——它就停住。冲决堤坝——它又流动。在方形容器里——它是方的，在圆形容器里——它是圆的。所以它是最重要和最有力的。”托尔斯泰赞赏的老子的话是如何说的呢？（要知道，托尔斯泰亲自翻译了老子的《道德经》）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又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惟不争，故无尤。”^① 这里，放弃与反对暴力是以水作比喻的，“不争”乃水之性，唯其不与万物相争，才能最好地帮助万物，也使自己不犯过失。因此，水表面看来是弱的，本质上却是强的，因为没有什么能代替它。这就是托尔斯泰说的“最重要和最有力的”根由。

一位研究托尔斯泰的学者曾指出，托尔斯泰本人不止一次地为对他学说的误解而进行过辩释。他讲过一个故事：有一群人在地里除草，草割掉了，但不久又长了出来，再割再长。于是其中有一个人对大伙说，大家不要割了，得想个更好的办法……然而，还没等这个人把更好的办法讲出来，人们便误认为他是反对割除那些有害的毒草，纷纷指责他，把他赶了出去。而地里的草呢，还是割了又长，长了又割，割了再长，情况一点也没有好起来。在这个故事中，托尔斯泰以割草指“抗恶”，那个说要想个好办法除草的人，便是他自己。至于人们说他鼓吹“勿抗恶”，实在是不懂得他的本意正是要将草连根拔起，是误解了他。连根拔，即从“内部去摧毁”，也即从根本上改变社会

^① 《道德经》，见《老子新译》第228、76页。

生活、世界秩序，乃至人自身。^①诚如斯蒂芬·茨威格所说，托尔斯泰“所梦想的是内心的革命……这是一次灵魂的革命，而不是拳头的革命。”^②

尽可以对托尔斯泰学说提出各种各样的批判，然而，任何批判至少应该建立在对这种学说内在本质的恰当理解与把握上。明白了托尔斯泰学说的精髓在于全人类普遍的爱，明白了他把沟通人的心灵的渴望作为自己人生唯一的最高法则，那么，对他学说的苛求甚至误解，只能认为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了。听听他在《与甘地书》中的声音吧：“爱，或者以别的名词说沟通人类心灵的渴望，是人生的唯一的最高的法则……这条法则曾被人间一切圣哲之士宣扬过：印度人、中国人、希伯来人、希腊人、罗马人。”

二

从这里出发，人的复活，社会复活的主题的深邃内涵便很容易被透视出来：托尔斯泰企图从根本上改变人性、改革社会生活入手，即根除“恶”的根源，以实现真正的复活。这在聂赫留多夫和卡秋莎这一对男女主人公形象的描绘中，得到了生动而真实的展现。

这是作为一对既矛盾又统一的艺术形象出现的。男主人公从认识“恶”的危害性开始，由兽性的人过渡到精神的人，走向了复活；女主人公则是从认识“善”的可能性开始，由克服

① 参见刘文荣著《列夫·托尔斯泰与中国》，《俄国文学与中国》第173至174页。

② 《欧美作家论托尔斯泰》第466页。

自身内心的惰性与麻木而走向了复活。男女主人公的复活经历了“善”战胜“恶”的缓慢而艰难的历程，其中充满了矛盾、痛苦、沉沦、觉醒的多次交织与反复。托尔斯泰的艺术才华在小说中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完美表现，被罗曼·罗兰誉之为“最后的高峰”、“最高峰”。^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托尔斯泰艺术创作的美学特征时，曾特别赞扬他善于准确地把握心理过程的形态和规律，揭示出人物“心灵的辩证法”，这就是从历史的、社会的、阶级的、家庭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对人物心理活动作细腻而深刻的描绘，特别是注重这种心理活动的变化、发展、矛盾、冲突的过程——“过程”，这是托尔斯泰写艰难曲折的复活之路，写灵魂在苦难中升华的鲜明艺术特色。

聂赫留多夫的复活过程是在灵与肉、动物的人与精神的人的对立、冲撞中完成的。

正在大学三年级读书的、十九岁的聂赫留多夫第一次见到美丽动人的卡秋莎的时候，“是个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诚实青年，时刻准备为任何善良事业而贡献出自己”，那时，他“亲自体验到生活的美好和庄严，体验到生活向一个人所提供的事业的全部含义，看到自己以及整个世界都有可能无限完善”。他对卡秋莎的感情是那么纯真，“不仅没有占有她的肉欲，而且只要一想到竟然有可能用这种态度对待她，他就会觉得可怕”。他对卡秋莎那轻轻一吻，“是贞洁的青年人与同样贞洁的姑娘之间互相倾慕而产生的”无比美好而圣洁感情的自然表露，充满了诗意。之后，每当同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一切就都变得更有趣味、更欢快、更有意义了，生活变得更欢悦了。”托尔斯泰如此

^① 《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61页。

细腻地刻画聂赫留多夫富有诗意的感情和高尚的激情，不仅是为了反衬出他以后的堕落、卑污、自私和荒谬，而且是为了显示出男主人公固有的人性，这种人性以独特的方式贯穿在他整个的生活过程中。

三年后，当聂赫留多夫升任为军官，在上流社会生活的放荡和卑劣欲望的诱惑下，精神的人异化为动物的人，他只顾自己享乐，不顾别的了，当初显得“神秘而优美诱人的”女人，如今却成了他“体验过的最好的享乐工具”。一句话，当初，“他认为精神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我，而现在，他却认为健壮旺盛的、兽性的我才是自身。”

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这里，托尔斯泰显示了他心理描绘上精确的细致与令人信服的逻辑性。小说中展现了无数生动具体的画面，说明根子在于环境——环境的“恶”和“恶”的环境。先是学校教育，然后是习惯观念、舆论的影响，尤其荒淫无度又无所事事的生活。聂赫留多夫也试图反抗、自拔，然而这种反抗、挣扎是困难的，“因为他在信任自己时认为是好的一切，别人却认为全是坏的；相反，他在信任自己时认为是坏的一切，围绕着他的所有人全都认为是好的。结果是聂赫留多夫投降。”于是，这位年轻而纯洁的男主人公开始不再相信自己，而相信别人了，而一旦走上了这条异化之路，一切便显得自在、和谐，各种难题迎刃而解，周围的人对他也由批评变成了夸奖。

然而，八年后，当聂赫留多夫在法庭上又一次遇见卡秋莎的时候，她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了他的灵魂，心底深处未泯的人性与良知再次苏醒，动物的与精神的两个聂赫留多夫开始打架，“精神的人，这个人自己寻求的仅仅是使别人也能幸福的那种幸福；另一个是兽性的人，这个人所寻求的则仅仅是自己幸福，为此而打算牺牲全世界的幸福。”在聂赫留多夫看来，卡

秋莎是善良的化身，美的精灵，想到她，便归于精神的“我”，离开她，抛弃她，则复归于动物的“我”，无可避免的陷入庸俗、愚蠢、伪善和空虚的泥淖之中。

于是，小说的男主人公决心扫除灵魂中的垃圾，摆脱人世的诱惑，开始了忏悔与赎罪的苦难历程。这个决心是真诚的，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拯救卡秋莎，更拯救自己堕落的灵魂。而在赎罪之中，他愈加认识到了自己罪孽的深重，反过来又愈加强了赎罪的决心，包括放弃一部分田产。这不是为了自我欣赏、自我满足，也不是为了进天堂，这是在“抖露过去的一切”中同过去决裂，同一切“恶”以及产生“恶”的生活决裂。这样，作为艺术形象的聂赫留多夫便在相当深刻的程度和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成为一个“最后的贵族”的典型，成为一个在新生活大门口忏悔的典型。

聂赫留多夫复活过程的真实度与可信性不仅在于作者写出了动物的人向精神的人嬗变的无比艰难曲折，而且在展现这种嬗变中，作者将社会激情与道德激情精当地交融在一起，既不停留在理智上的选择这样肤浅的公式层面上，又不以个体的偶然性冲淡历史的必然性，或者以作者理想的假定性替代现实的真实性。这样，聂赫留多夫的复活在与现实生活（“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的紧密联系之中显得非常真实和深刻。这位忏悔的贵族终于认识到：“我并不是使她改过自新，我只想使自己改过自新。”至此，聂赫留多夫的形象达到了双重的哲理概括的高度，即一方面，他的堕落反映了上流社会的腐蚀作用，作者借此打开了一道揭示社会问题的大门，读者从中看到了无以计数的社会弊病，看到了专制统治的反人性的本质，也看到了作者对人生的深邃思考；另一方面，他的反省和复活显示了一种时代的趋向，也显示了道德自我完善的可能性与迫切性，作

者借此为自己学说的精义划出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是艺术家的托尔斯泰忠实于生活的伟大，也是他忠于自我信仰的不足。罗曼·罗兰说得好：“我确信，尽管托尔斯泰很自信，但在他心底里，艺术家的真实和信仰者的真理这两种不同的品性绝不是完美结合的。”^①

作为下层妇女形象的卡秋莎的复活，同样经历了漫长的精神演变过程，她的生活经历是从小说所描绘的社会现实的基本冲突的角度展示出来的。少女时代，她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希冀，但受尽欺凌的悲惨命运很快使她沉沦，然后是逐步的觉醒并最后走向新生，这个沉沦——觉醒——复活的过程，显示了卡秋莎这个贫民出身女子不可摧毁的人性力，正是这种蕴藏在灵魂深处的高尚品格，帮助她克服精神危机，引渡她从恶返归于善。

卡秋莎对人生态度的急转，始于那个阴雨、有风的秋夜。当她得知聂赫留多夫乘坐的火车将在深夜两点路过这个地方时，已经怀孕的这个依旧天真的女子决心不顾一切地冒着秋雨和泥泞到小火车站去看他。小说描写的这一幕的情感力度真是无比强烈，那感人至深的情感直觉造型令每个有善良之心的读者唏嘘不已。这样，这个可怕的夜晚便成了卡秋莎人生转变的契机，她从此“不再相信善心了”，“所有那些嘴上说说上帝、说说善心的人，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骗人罢了”，“而且不论什么人，就只有寻欢作乐，除此而外，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别的事了”；至于那个曾给过她热烈爱的男人，她也决心“把她同他的往事回忆全部埋葬掉了”。

一个无依无靠的天真善良的弱女子，连她认识的人中“最

^① 《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65页。

好的人”都如此无情地冷酷地欺骗了她，遗弃了她，她还能指望什么呢？等待她的只有生活的阴湿和冷冰。她被逐出庄园，受尽侮辱，最后又沦为妓女。她接触到的无耻自私、疯狂的一幕幕惨状，逼迫她堕入了精神的深渊，她的肉体遭受蹂躏，她的精神也渐渐麻木，她逐渐习惯了丑恶，甚至从中“找到了许多好处”，认为给了自己“信心和自尊”……天性中的活泼善良无邪纯洁的人性几乎丧失殆尽。于是，当那个早已忘却的陌生男人提出要将她“引出到另一个世界去”的请求时，她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她对聂赫留多夫的“赎罪”请求冷漠以对，她认为过去的一切早已结束，回首往事，既无必要，徒增痛苦而已。

卡秋莎的复活是如此的缓慢而艰难，她心安理得地顺从自己放荡的恶习。这样，托尔斯泰就从另一个侧面无情地鞭笞了社会“恶”对人的侵蚀。然而在托尔斯泰看来，一个普通下层人的灵魂创伤不管多么严重，他终究可以、也应该挺直起身来，只要环境得到改变，只要生活重新鼓起他信念的风帆，生命的航船便会重新掉头，驶向彼岸。

对聂赫留多夫的态度从麻木而变为仇恨，是卡秋莎走向复活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当那个先是给了她奇妙的欢乐，接着却残忍地给了她一长串耻辱与苦难的、曾经是她爱过的人，如今站在监狱里的铁栅旁，提出要跟自己结婚，卡秋莎压抑在心底的痛苦便不可遏制地迸发了出来：

“你给我走开！我是个苦役犯，而你是一位公爵，这儿用不着你来！”

“你今生利用我玩乐，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你让我讨厌，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整副又肥又丑的嘴脸！走，你给我走！”

卡秋莎的整个面容都被愤怒弄得变了样子，这情感的爆发意味着那种固定下来的对人和现实的认识已被打破，意味着沉

入心底的人性之善开始觉醒。无论她如何严词拒绝聂赫留多夫的请求，毕竟，聂赫留多夫那些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话语打动了她，将她重又引向那受苦的世界里去了，使她痛苦地直面人生，使她感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忘掉一切，稀里糊涂地生活下去。“她的内心进行着一种痛苦的作业”。

“恶”摧残了卡秋莎，“恶”使她堕入深渊，放弃了人生的价值，而当她重新燃起对“善”的追求的炽热情感时，过去曾持有的对生活的信念便重又在眼前闪亮，要做一个与这十年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人的愿望逐渐强烈起来，“她正在复活”——聂赫留多夫看到了卡秋莎内心世界里发生的这种巨大转机。

如果说聂赫留多夫的精神影响叩开了卡秋莎天良和道德的心扉，那么促使卡秋莎最终摆脱精神危机的，则是在她进入政治犯的独特环境之后。这些大多具有高尚情操的政治犯，把她看成一个平等的、内心具有许多优点的人。这就使卡秋莎感到：聂赫留多夫向她求婚，主要是出于一种赎罪的慷慨；而革命者西孟生爱她，却仅仅是因为爱她。于是，想使自己变得更好的热切愿望一步步地指引她实现人性的复苏，最终推动她走向了复活。摆脱过去阴影的渴望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二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又相互促进，否定了“恶”，“善”的旗帜便在心头又一次飘扬起来了。卡秋莎，作为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渐觉醒并逐步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形象，在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中，还是第一次做主人公。这个鲜活而丰满的艺术形象。已经越出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之心描绘下层女子的格局，而深刻地反映了她坚定的人格力量以及当时俄国社会“汹涌激荡的人民的海洋”。

聂赫留多夫与卡秋莎的复活，显示的是社会的主题，即对无人性、反人性的愤怒鞭挞，对人性的善与美的热情礼赞。在

小说中，人性集中表现为对人的个体本然生命的承认与尊重，而反人性，则是一切恶的根源。只有从根本上摧毁恶，改造恶的根源，人才能复活，社会才能复活。托尔斯泰学说的内在本质，在男女主人公形象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三

聂赫留多夫和卡秋莎从各自的起点出发，经历了各种不同的生命历程，最后都走向了一个终点，或者说都在朝一个目标走去，精神道德在自我忏悔与自我改造中得到了升华。当然，作者也明白，精神道德的自我完善未必就此带来对“恶”的根源的铲除，这是一项更为艰难的社会工程。但是，如果人人都关注着道德的自我完善，对“恶”的现象与行为不是同流合污或者沉默不语，至少，这个世界便会逐步变得美好起来。

其实，谁的灵魂深处不是同时并存着生命的两种内驱力呢？是与非、真与伪、善与恶、良与莠，深藏在每个现实人的心灵之中。狄德罗说得好：“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黑格尔对此曾有过哲人的概括，他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歌德把这种“丰富的统一体”称之为“单一的杂多”，他在《浮士德》里形象地作了阐释：

啊！你只知道有一种冲动，
另外一种你便全然无知！
有两种精神居住在我心胸，
一个要想同别一个分离；

一个沉溺在迷离的爱欲之中，
执拗地固执着这个尘世；
别一个猛烈地离去凡尘，
向那崇高的灵的高地飞驰。

难道有纯粹的、单一的“自我”？无论是善人恶人，人类总处在自身两个矛盾对立面的撕裂与扭结之中。无可奈何又回肠荡气的矛盾和冲突，混沌和变形，分裂和统一，异化和复归，构成了人生舞台上的一幕幕活剧，有时令人忍俊不禁，有时又使人潸然泪下。

再进一步思考，何止是人类的某个个体，即使一个集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人会有阴影，会犯错误，误入歧路，一个群体有时候也会如此。对于一个人，有人格、正义和良心的问题，对于一个社会，也有社会人格、社会道义和社会群体的心理完善以及心理结构的改造的问题。如果这样认识与把握世界，认识与把握人和社会是合乎实际的话，那么，我们顺理成章地便须高度关注对自身生命意识的自觉把握，既不因对善的追慕而忘却了恶的存在，也不因对恶的愤怒而淡漠了对善的呵护。精神道德的不断完善，群体心理结构的不断改造，应该作为一个健康、健全的人和社会不可动摇的准则，这或许正是《复活》放射的道德真理的精神之光给我们的昭示。

中国有句古话：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然而，未必都能恰当地理解话中的真义。在有些人那里，情况往往成了这样：既然人无完人，那么染指于恶既无伤大雅，见善不为心地也照样平衡；进而认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做过一些蠢事，也合情合理，用不着大惊小怪，用不着追根究底。于是，世事人事的弊